

ZHONGGUOSICHUAN



# 彝文论

丁椿寿 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MINZUCHUBANSHE

(川) 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 李世荣

封面设计 周宝工

内文设计 李明德

彝 文 论  
丁椿寿 著

---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开 字数172千 印张7.25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书号 ISBN 7—5409—0659—6/H·41

定价 3.85元

椿寿同志：

承蒙著《文艺论》，业已收到。谢！

这是我所见到的全面系统地论述文艺性质  
和结构等问题的第一本书，门道真认真，

并向我所同志推荐。此致

敬礼！

王 灼

1983年8月28日

# 弁 言

本书于一九八三年七月由贵州省彝族历史文献研究会（筹）油印五百本分发给国内各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省县级民族事务委员会、图书馆及个人。此后，笔者获得各方面的鼓励和支持，陆续收到一些单位和个人要求索阅或预订的来信。同年十月下旬，为满足读者的需要，笔者藉至北京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之便，复将手稿交给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承学会决定铅印一千本。只因当时印刷技术问题难获解决，未能立即付印。至一九八五年夏，印刷技术问题有望在贵阳解决，但又因为学会经费压缩无力付印，故延至今。为此，笔者对一直等待此书的单位和读者深抱歉意。

本书原是笔者的一本文集，是由已经发表的和未经公开的几篇论文组成的。印发后，笔者于一九八四年又将其改写为专著。此次，西南民族学院邀笔者为民语系彝语专业开设彝语文字学一门学科，因一时不及编写教材，即以本书权当课本。为充实授课内容，笔者又作了一次修改和补充。

本书内容，除导论部份着重论述了研究彝族文字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彝族文字的概况、研究彝族文字应注意的问题和研究彝族文字的方法外，共分彝文是独立的民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彝文的发展、彝文的类型、彝文的四种结构、彝文的结构系统和结构方式、怎样进行彝文结构的剖析、彝文的假借字、彝文的字体、彝文的异体与繁简字、彝文的规范化、彝文的正字法和书写、古彝文与现行规范彝文的使用、彝字与彝语词、语素、音节的关系、彝文字汇的收集、整理与彝文字书的编写等十六章。

在彝文是独立的民族文字一章中，首先指出彝文仿汉字论的错误之说，然后以彝汉文献中有关记载彝族先民自创文字的事实，并以我国以汉字为模式仿制的各民族文字作为论据，论证了彝文不是仿汉字的仿制字，而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字。

在彝文的起源一章中，笔者以西安半坡出土陶文与贵州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中河乡出土陶文和今存彝文古籍中的彝字对比为例，结合汉文和彝文的文献资料，就彝文的起源时期进行了探讨。

在彝文的发展一章中，笔者论述了彝文由象形而指事而会意而形声而转注而假借的发展过程，同时指出了彝文由表意向表音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彝文的类型一章中，笔者以彝文的象形字（如𪛗 [zi<sup>21</sup>] “水”）、指事字（如𪛖 [ne<sup>21</sup>] “低”）、会意字（如𪛗 [dɛ<sup>21</sup>] “油”）<sup>①</sup>、形声字（如𪛗 [su<sup>33</sup>] “觅”）<sup>②</sup>为例论证了彝文既不属于单纯的象形字，也不是表音的音节文字，而是一种具有独自体系和独自特点的表意文字。

在彝文的四种结构一章中，笔者对彝文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字的结构方法和结构特点分别作了论述。

在彝文的结构系统和结构方式一章中，笔者就彝文的结构系统，分别从彝文的笔画系统、偏旁系统和部位系统三方面进行了讨论。在彝文的结构方式方面，根据彝文的造字方法，就彝文的不带表音成分和带表音成分两种结构方式作了论述，指出彝文的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属于前者，形声字属于后者。从彝文字体结构方面，又指出了彝文中的独体结构（如象形字、指事字），

① 该字由“𪛗” (zi<sup>21</sup> “水”) 和“𪛖” (bi<sup>13</sup> “爪”) 二字组成，以水经手搅不清表示“油”。

② 该字由“𪛗” (ɣu<sup>33</sup> “头”) 和“𪛗” (su<sup>21</sup> “找”) 二字组成，以看着找表示“觅”。“𪛗”既表意又表音，“𪛗”起辅助说明字义的作用。

和合体结构(如会意字、形声字),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彝文既有独体的文,又有合体的字,从而否定了“彝文只有独体的‘文’”的错误之说。

在怎样进行彝字结构剖析一章中,笔者分别就彝文的独体字和合体字的结构进行了剖析。对那些难于剖析的彝字结构,特别是合体结构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笔者在分类阐述时,一面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一面提出有关剖析某类结构的方法,力求便于读者在了解彝文独体结构和合体结构的规律的同时,能够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和剖析彝字结构的一般方法,从而能够独立剖析彝字的结构。

在彝文的假借字一章中,首先指出彝文古籍中假借字多的原因。在讨论彝文假借字的基本情况时,除指出彝文本有其字的假借和本无其字的假借两类假借字外,还讨论了彝文假借字的来源以及假借字的音变等情况。

在彝文的义借字一章中,首先指出了义借字是彝文处于表意时期的产物,是至今始为人知的“六书”以外的另一种造字方法。然后就义借字的义借对象、造字方法以及它与假借义和引申义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中着重指出:义借字在彝文古籍中的使用,不仅提高了许多字的利用率,使其在记录彝语词方面扩大了使用的范围,为解决彝文因造字不足而存在字数不够用的问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且让人们在认识彝文的造字方法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为人们在研究包括汉字在内的所有表意文字的造字方法方面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在彝文的字体一章中,笔者指出彝文的方块字体是它的表意的结构形式对它直接影响的结果,也指出它与汉字和其他方块字之间的异同。同时,笔者还以不同时期的彝文图片为例,对彝文字体的演变情形进行了阐述。

在彝文的异体与繁简字一章中,对彝文古籍中的异体字与繁

简字分别作了阐述。在异体字方面，笔者阐述了彝文古籍中异体字的使用情况、异体字与通假字的区别、书写形式的变化以及异体字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在繁简字方面，指出简化是彝文发展的趋势，同时提出了对繁简字进行整理，制定出繁简字对照表的要求。

在彝文的规范化一章中，笔者于论述彝文超方言性质的同时，除主张使用现行规范彝文为现代彝语服务外，并提出了川滇黔桂四省区统一规范古彝文和采取“书同文”做法的主张。因为这一做法符合四省区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彝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

在彝文的正字法和书写一章中，笔者根据书写彝文字形存在的紊乱现象，着重讨论了讲究正字法的必要性，指出通过正字法在给彝字定形、定义，限定每个字的使用范围，使每个彝字都有固定的基本意义和用法，以限制任意使用同音字的做法。在讨论彝字书写的问题时，阐述了彝文的书写款式，并提出了有关书写的要求。

在古彝文与现行规范彝文的使用一章中，笔者就古彝文和现行规范彝文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配合使用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论述。在讨论古彝文和现行规范彝文的使用范围时，着重指出：古彝文只能用于阅读、翻译、研究彝文古籍和研究彝语文字学，不能再适应现代彝语发展的需要；现行规范彝文则宜用于交流全民思想，作为记录现代彝语，发展彝民族文化教育和科学的文字工具。要求人们消除不利于规范彝文推行的思想障碍，以同样的态度爱护重视、使用古彝文和规范彝文，使其发挥各自的彼此不能替代的作用，促进彝民族教育的普及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在彝字与彝语词、语素、音节的关系一章中，笔者对彝字与彝语词、语素、音节的关系分别作了论述，并且指出了彝语具有字与词不易（不是不能）区分的特点。

在彝文字汇的收集、整理与彝文字书的编写一章中，笔者就收集、整理彝文字汇以及编写彝文字书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在上述工作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书末，为向读者提供有关剖析彝字结构的实例，提供有关研究彝文一形一音数义字和一形数音数义字的资料，为便于读者了解《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和《彝文规范字表》，特附录了《彝字结构剖析示例》、《一形一音数义字及一形数音数义字》以及《彝文规范方案》和《彝文规范字表》，作为参考。在《彝字结构剖析示例》中，笔者列举了彝文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六百余例，并对每个字的结构逐一进行了剖析。通过对这些字的结构剖析，也确定了每个字的本义，使其成为真正的形、音、义的统一体。

本书是以古彝文为研究对象的一本文字学著作，其中只在讨论彝文规范化和使用问题等章中涉及到规范彝文。为区别古彝文和现行规范彝文的称谓，以免混淆产生误解，书中称古彝文为彝文或古彝文，称规范彝文为规范彝文或现行规范彝文。

本书系从彝语文字学的角度探讨它的起源、发展及其类型、结构等一系列问题，目的在为彝语文字学建立自己的体系，并为彝语文研究者提供一本参考书。

本书所用彝文字例，均用国际音标注音，这样做，既便于彝族读者阅读，也便于其他民族和外国人士学习研究。

本书在写作中，引用了有关著作中的一些言论和文字图片资料，除于书中一一注明出处外，特向原著的作者、译者、编者附致谢忱。

本书于一九八三年七月首次印发后，承王力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但因先生于去（一九八六）年逝世，未能见到本书正式出版，除对先生表缅怀之情外，深以为憾。

本书首次印发后，复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及西南民族学

院给予关心和支持，于此致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多承各方友好关心支持，并承叶琴侠同志帮助做了许多工作，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此次承四川民族出版社列为重点出版物予以出版并为出版本书做了大量工作，特表衷心感谢。

丁椿寿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西南民院



作者近影

# 目 录

|                               |       |
|-------------------------------|-------|
| 弁言                            | (1)   |
| 导论                            | (1)   |
| 第一章 彝文是独立的民族文字                | (24)  |
| 第二章 彝文的起源                     | (34)  |
| 第三章 彝文的发展                     | (43)  |
| 第四章 彝文的类型                     | (51)  |
| 第五章 彝文的四种结构                   | (60)  |
| 第六章 彝文的结构系统和结构方式              | (71)  |
| 第七章 怎样进行彝文结构剖析                | (88)  |
| 第八章 彝文的假借字                    | (99)  |
| 第九章 彝文的义借字                    | (108) |
| 第十章 彝文的字体                     | (113) |
| 第十一章 彝文的异体与繁简字                | (121) |
| 第十二章 彝文的规范化                   | (128) |
| 第十三章 彝文的正字法与书写                | (135) |
| 第十四章 古彝文与现行规范彝文的使用            | (138) |
| 第十五章 彝字与彝语词、语素、音节的关系          | (144) |
| 第十六章 古彝文字汇的收集、整理与古彝文<br>字书的编写 | (155) |
| 附录一《彝字结构剖析示例》                 | (162) |
| 附录二《一形一音数义字及一形数音数义字》          | (196) |
| 附录三《彝文规范方案》                   | (216) |
| 《彝文规范字表》                      | (220) |

# 导 论

彝族自称“𪎭𪎮” (nm<sup>55</sup>su<sup>33</sup>)，汉语音译为“诺苏”、“纳苏”、“纳素”、“楚素”或“内素”。彝族古称为“卢鹿蛮”。后世称“保罗”或“罗罗”，这是由卢鹿（即古卢罗）的音转而来。我国解放后统一定名为“彝”。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有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它居住在我国西南川、滇、黔、桂四省（区）的境内，有六百五十多万人口（一九九零年统计）。彝族有独自的语言和文字。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彝文属表意体系的文字，史志上称彝文、彝字或保文、罗罗文，是一种古老的、具有独自特点的文字。在彝族的文化遗产的宝库中，拥有数以万计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是彝族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

彝族历史文献，丰富多采。虽然彝族历史文献在历史上屡遭浩劫，散失和毁坏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但是在今存的彝文古籍内容中，仍然包括有关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宗教、哲学、科学、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和医药等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还有彝文铜刻、石刻和木刻等大批珍奇的历史文物。这些彝族历史文献和金石文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都具有极大的资料作用。

搜集、整理和翻译彝族历史文献，只是抢救的手段，不是抢救的目的。将搜集来的彝文古籍加以认真研究，从中去粗取精，

使其有益部分为我国“四化”服务，才是抢救的目的。但是不论从事翻译或研究，首先都必须解决文字的过关问题。由于历来缺乏对彝族文字结构学和字义学的研究，加之以讹传讹的影响，任意使用同音字的混乱现象极为严重，致使今人对许多字的本义及其引申义都弄不清楚，直接影响翻译质量的提高与对彝文文献的研究。为弄通彝文，消除阅读彝文古籍的困难，提高翻译质量和研究的水平，在搜集、整理、翻译与进行各种学科研究的同时，还需加强对彝族文字的研究，把它列为研究彝族各个学科中的首要的科研课题，是很有必要的。

收集、整理彝族文字的工作，自古已有人做。虽然这些工作做得很不够，成果不多，内容还不完善，但是从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彝文字汇和字集来看，过去的工作者已经为我们今后从事收集、整理彝族文字的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彝族文字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最早始于何时，由何人所做，因为限于资料的缺乏，目前还很难确定。约于公元五百五十年，唐时纳垢酋阿喃做了一次收集、整理彝族文字的工作。他把经过收集、整理的彝文称为“𪛗书”，作为当时的“标准文字”。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未能看到他的这次工作所遗留下来的书面成果。是他当时没有汇编成集，还是编了后来又失落或毁坏了呢？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明代王朝组织编写，现今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华夷译语》，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为时较早的一部民族语文工具书。其中彝文部份把分属于现今川、滇、黔三省五个地区的彝文字、词，按“天文门”、“地理门”等学科分为十九个门类，并且采取汉译和注音的方式编成。这是一部研究各省彝族文字和其他民族语言难得的资料书。

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间，没有再出现经过收集、整理编写的其他工具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法国人Paul Vial经过收集、整

理编写出一本彝文与法文对照的《法罗字典》（1905年初版，1909年再版）。其后，艾尔弗雷德·莱塔德又写了《试论法罗辞典》（1911年）和《（阿细）罗法字汇》（1912年）。

收集、整理彝族文字的工作受到广泛的重视，而且出书较多的，还是在我国解放以后。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写的有七千多字的彝汉文对照的《彝文字典》，四川省凉山州语委编写的有八千字的《彝文单字汇集》、四川省彝文工作组和凉山州语委根据《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合编的《彝文检字法》、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史研究室编写的《彝汉简明字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化研究室编写的《禄劝彝文字词资料》，广西编的广西彝文字词资料，虽然多属油印的初稿，还不够完善，但是在现今缺乏彝文工具书的情况下，这些书对于研究彝文文献和彝族文字来说，无疑是很宝贵的。

翻译和研究彝族历史文献的工作，虽然起始时间较晚，但是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国解放以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各个彝区都设置了彝文编译机构，译著不断出现。解放前，国内外有杨成志的《罗罗太上清静消灾经对译》（1933年），丁文江编纂与罗文笔译的《彝文丛刻》（1935年），马学良的《保文作斋经译注》（1946年），伯希和引的《禄劝的保保碑文》等译著。解放后，已经正式出版的较有价值的译著，有罗国义、玉兴友合译的《西南彝志》并经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整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选集；有四川省彝文工作组整理的《彝族格言》（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有罗家修搜集整理的《玛牧特衣》（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编译局搜集整理的《妈妈的女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等。其中尤以丁文江编纂的《彝文丛刻》，“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它仍是中外出版的彝文经典研究著作中唯一的一

部巨著”<sup>①</sup>。近年来有关翻译、研究彝文文献的著作很多，因限于篇幅，未便一一列举。

若干世纪以来，彝族文字研究的领域，一直是个少人问津的秘区。它的很多情况，诸如彝文的起源和发展的情况，它的性质以及它的形体结构、意义和读音的情况，都急需人们去探讨。近世国内外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也有一些著作，国内有闻宥的《读彝文丛刻——兼论傣文之起源》（1936年）和《川滇黔傣文之比较》（1947年），柯象峰的《傣文之初步研究》（1938年），葛毅卿的《西南边民文字》（1945年）、江应樑的《西南边民的特种文字》（1945年），钱梦超的《彝文概述》（1941年），李元福的《傣傣的文字》（1944年），马学良的《彝文与彝文经书》（1981年），陈士林的《论彝文的起源、类型和造字法原则问题》（1984年），余宏模的《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1978年），丁椿寿的《论彝文的类型及其超方言问题》（1981年）等论著；国外有Hyde Clarke的《华西夷文》（1982年），Paul Vial的《云南彝文研究》（1890年），E·H·Parker的《彝文》（1895年），F·Hester Mann的《云南傣傣族文字》（1915年），亨利·科尔迪埃的《傣傣的现实形态问题》（1907年），布鲁豪尔的《坚固的堡垒》（1947年），弗兰克的《华南漫游记》（1964年），西田龙雄的《中国西南部的傣傣文字》（1980年）等论著。但是许多根本性问题至今仍未获得解决。回顾已往的数十年间在彝族文字研究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有三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彝族文字起源时期的问题；再一个是关于彝族文字所属类型的问题；第三个是关于彝族文字是否属于独立的民族文字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又以对彝文类型问题的争议比较突出。

关于彝族文字的起源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

---

<sup>①</sup>马学良：《增订彝文丛刻》序言（《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

彝文创自明代说。持此论者认为今存的彝文文献仅见于明代。这种见解显然不符合彝文的实际。对于这种见解，持不同意见的人较多。认为：“我们研究一个民族文字的创始期，不能以现存文献为凭证，即以汉文而论，我们不能以今存最早的甲骨文年代推断汉文创始于殷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今存明代彝文文献即断为彝文的创始期”（马学良语）。事实很清楚，如果彝文创自明代，如此浩瀚的彝文文献也就不可能出自明代了。须知，彝文“文献的记载，句子的规整”（唐兰语），都说明了彝文于明代已不是处于创始期的文字，而是已经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了。这个问题，自贵州威宁中河乡陶文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出土之后，已被彻底否定，不再成其为问题。

第二种是彝文创自唐时纳垢酋阿呵之手的说法。这一论者，主要是以汉文典籍的记载为依据。《一统志》卷八百四十八谓汉时纳垢酋之后阿呵撰𪛗书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彝人至今习之，以为书法”；《滇系》谓阿呵撰彝字一千八百四十多个，“号书祖”。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阿呵只是对彝文（即彝文）做了一次整理、规范的工作，并不是彝文的创制者。其实，阿呵称这种文字为标准文字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阿呵之前已经有一种他认为不标准文字的存在。否则，如果当时只有阿呵创制的一种文字，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原有彝文，阿呵也就没有称这种文字为“𪛗书”（即标准文字）的必要了。何况，彝文与其他民族文字一样，是由本族先民共同创造的，不可能只由某个人独自来创制。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种“创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代”的说法。这一说法与第一种说法都是出自陈士林一人之说。他改变其“彝文创自明代”的原来说法，又提出了这一“假定”。当然，彝文创自阿呵之手也好，陈氏的“假定”也好，也都随着贵州威宁中河乡陶文的出土而被否定了。

第三种是彝文的前身系白狼文说。这一说法是《彝文丛刻》

的编者丁文江在他的序言中对彝文来源问题的一种“假设”。马学良认为这一“假设”“有一定道理”，并且依此将彝文的创始期“上推至东汉”<sup>①</sup>。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说白狼文就是已经写下的文字，而且就是彝文，这也只能说彝文至此已经达到可以记载史实的程度，而不是处于创始期。何况，时至中河陶文出土已经数年的今天，离开中河出土陶文孤立地只以白狼文作为推论彝文可以“上推至东汉”<sup>②</sup>的依据的做法，尚可研究。威宁彝族苗族回族自治县中河乡出土的陶器，据考证系出自“西汉早期”的产物，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结合今存彝文文献中的彝字考查，这种陶器上的文字，并不是原始的彝文，而是经过长期演变已经脱离了原始形式的文字，与今存彝字的笔画结构基本相同。根据彝文文献中对创造彝文的记载，再从文字的一般演变情况来看，彝文的形成时期还应由此上推一千多年的索雅德时代。否则，中河出土陶文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程度的。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处的不是丁文江编纂《爨文丛刻》的那个时代，他那时尚未见到贵州威宁的中河出土陶文，他当时以白狼文作为研究彝族文字来源的依据，虽说是“假设”，但是也为探索彝文来源的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即使这种“假设”不能成立，也不能说不是有益之举。不过，时至今日，再离开中河出土陶文和有关记载彝文创制时期的彝族历史文献，而孤立地以白狼文作为研究推断彝文来源的依据，似觉不妥。

第四种是彝文起源于六千年之前说。主此说者较多。我曾著文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以汉文献中有关彝文创制时期的记载作为立论的依据外，主要以彝族历史文献中的一些有关彝文创制情况的记载作为立论的依据，以“哎君不知年，

① 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民族语文》1981年，第1期）

② 何凤制：《威宁中水“西南夷”公共墓地的调查和发掘》（《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